

中日譯書 及 日譯中書 綜合目錄

編後記

譚汝謙

中日之間兩種譯書目錄終於編好了，喜馬拉雅山和富士山壓在肩上的重擔，可以暫時卸下歇歇。編輯工作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開始的。當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決定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主辦「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邀請本港及海外學者共同探討二千

年來中日之間文化交流及其影響，我也應邀參加籌備工作。多年來我自己埋頭於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知道各地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日漸進步，可惜學者之間很少接觸，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趨勢，對交流意見、切磋學問不無影響。這次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將可彌補過去缺憾於萬一。因此，我以誠惶誠恐的心情參加籌備工作，同時請求中國文化研究所考慮出版中日之間兩種譯書目錄，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一份系統性的研究資料和便利。承蒙陳荆和所長和校內外各方面熱心支持，兩種目錄的出版事宜很快就決定下來，而且把編纂的責任交給我，希望趕及在研討會之前出版。

最初的設想是敦請日本實藤惠秀、松井大作、小用博三位先生、韓國洪淳昶先生和我一同合編，因為四位先生都是這方面的老前輩；而且打算請小川先生負責編輯《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由我負責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分頭進行工作，以爭取時間。實藤和小川諸先生都同意上述計劃。但一開始工作，就發覺原來的設想不易實行，地域阻隔，時間限制，編務浩繁，在不容許全靠通訊進行工作，而且需要大量編輯助手，一時很難籌措經費應付兩個編務小組的支出，而我幸運地獲得本校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及新亞雅禮特別計劃基金補助研究費，又蒙好幾位師友答應義務協助，所以由我承擔兩種目錄的一切編務。在編纂過程中，遇到疑難，我經常寫信向實藤、小川兩位先生請教，並且定期報告工作進度。

早在一九六八年夏天，當我從美國轉去日本留學，就有整理中日關係文獻的意念。一九六九年六月第一次拜會實藤先生時也透露這一意念，並蒙實藤先生多方指導和勉勵。在留日兩年期間，我和內子譚麗萍女士利用京都大學和關西地區好幾間圖書館，蒐集二萬餘條中譯日本書籍和論文資料，又收錄近萬條有關日本文化的中文書籍和論文資料，各附簡短提要。我一直覺得我們倆的工作只是一個開端，尚未完成，故此沒有想過在短期內出版。這一次，

要不是「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的召開，我也不會着意先行整理兩國之間譯書的目錄，留待將來再算。

編纂譯書目錄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搜集資料的困難，很多圖書館都不大重視購藏譯本，彷彿覺得譯本沒有價值，因此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圖書館藏書目錄去搜求資料，必須從多方面設法，包括參考零碎的書店目錄，各種專著所附參考書目，甚至向個別學者請教。雖然，實藤先生在半個世紀前就開始蒐集譯書資料，也編刊過一些目錄，不過遺漏甚多，我們必須大量增補。在過去一年來，我先後參考了來自日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歐美等地大小長短目錄約四、五百種，其中有些是未定稿和非賣品。我又借閱和購買近千種譯本——包括一些無聊、過時的譯本，花費一筆購書費不打緊，但花費時間去翻閱它們却是件痛苦不過的事。爲了解譯書事業的實況，爲了獲得譯書資料，只好硬着頭皮去做。兩本目錄一共著錄譯書九千一百種（見附表）：

表一 中日之間譯書統計表（一六六〇—一九七八）

譯 書 類 別	總 類	別									
		哲	學	自	然	應	用	社	會	歷	史
文 別	數	宗	教	科	學	科	學	科	學	地	理
中譯日文書	五	三八	五二	一、四五一	一、五八	五二	一、〇一五	二〇	五、七五		
日譯中文書	五	五九	五	二、一〇四	三、一〇四	三五	一、〇一五	五	三、三五		
合 計	一〇	九七	五七	一、六八二	五、三	九六	二、〇三	二五	九、一〇〇		

- a 即《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之「1.哲學」及「2.宗教」二類的總數。
- b 即《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之「6.中國史地」及「7.世界史地」二類的總數。
- c 即《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之「5.工學、技術」及「6.產業」二類的總數。
- d 即《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之「8.語學」及「9.文學」二類的總數。

雖然數量不算太少，但是遺漏仍多，就目前收集到而不及放入「補遺」的，已達三百種。我們繼續努力訪書之餘，亟盼各地同道學者惠賜補遺資料。

考訂譯書資料也是一大困難，很多書目所列舉的資料都不完備，有的欠缺著者，有的欠缺譯者，大部分不錄出版者和出版年，著錄頁數和開本的更少，附錄內容提要的尤屬罕見。不少譯本把著者姓名弄錯，有的索性不錄著者姓名。「著」「譯」不分，似乎是中日出版界非常普遍的現象，直到今天仍未改變。例如，東京明治書院出版的一套《新譯漢文大系》（一九六四——一九七〇年），封面和版權頁一律標明某某「著」，其實這是一套中國古典文獻的日文注譯叢書。有時爲了參訂一項資料，我們得花費幾天時間，有時徒勞無功，只好無可奈何地存疑，期待日後有機會補訂。

索引的編纂是最艱巨的工作。《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的三種索引都按漢字筆劃的多寡，再依「永字八法」（點、橫、豎、撇、捺）順序排列；《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的三種索引則按日語讀音的A B C D次序編排。兩本目錄的索引首字檢字表分別以筆劃、四角號碼、漢語拼音、日語讀音排列。用日語讀音拼寫人名和書名的困難，不必細說了；即使漢字筆劃多寡的計算和筆劃先後的次序，不論在中國或日本，往往因字體、寫法、或習慣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中國方面，「成」字一般字典作七劃，我們從通行寫法，參照中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編訂的《中文目錄檢字表》（一九五四年），將「丁」作一筆，置於

六劃；又如「黃」字十一劃，字典作「黃」，爲十二劃，我們在十一劃處立參見條，使在十一和十二劃兩處都可索檢；同理，「龜」字亦可於十六和廿二劃兩處索檢。在日本方面，「鷄」(十九劃)是標準寫法，但也有人寫成「雞」(十八劃，這是中國繁體字標準寫法)和「鷄」(廿一劃)，我們只好在十八、十九、廿一劃三處都立參見條。

中日漢字寫法的差異，有時似是而非，平添植字和校對不少煩惱。尤其是在《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原則上我們採用日本現行通用漢字的寫法，成爲香港不熟悉日語的植字工友一大負擔，例如：內〔內〕、舍〔舍〕、吳〔吳〕、淚〔淚〕、寬〔寬〕、搜〔搜〕、漢〔漢〕、德〔德〕、隆〔隆〕、惠〔惠〕、擊〔擊〕、隱〔隱〕、賴〔賴〕等等。植字工友最初以爲我們寫錯白字，一一「改正」原稿。中日簡體字的差異，也增加植字和校對的困難，例如：「芥川竜之介」經常誤植「芥川董之介」；經過二校三校之後，植字工友大概對日本簡體字敏感起來，見到「董」字就自動改爲「竜」字，有時甚至植作「龜」字，於是使「童話」變成「竜話」或「龜話」。

爲了同時照顧中日讀者，我們的索引和首字筆劃檢字表得煞費苦心。例如，「隨」字須在六處出現。該字在中國寫成「隨」，由於「」可作二筆或三筆，而「」可作三筆或四筆，故該字總劃數可作十四、十五、或十六劃。「隨」字在日本寫成「随」，由於「」可作二筆或三筆，而「」(「」)也可作二筆或三筆，故該字總劃數可作十、十一、或十二劃。因此，爲了同時便利中國和日本的讀者，在《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的「索引首字筆劃檢字表」上，「随」(隨)字在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及十六劃六處都可索檢。又，因爲印刷技術等多種困難，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和各種索引及檢字表，中國的漢字寫法概以流行的繁體字爲準，不能同時兼顧簡體字；這一缺憾，我們感到歉疚。中日兩國漢字的差異比比皆是

，使我們痛感：中日讀者享受「同文」的便利，似乎必須付出相當代價，而這種代價似乎並非絕對必要的。因此，我們希望漢字文化圈的有心人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早日訂定一套統一漢字的辦法來。

時間的限制是我最感痛苦的事。誠如前面所說，照原來計劃我只負責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後來又要兼顧《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工夫多一倍，出版日期並不因而延展，這已經是一大挑戰，但我也有信心應付這一挑戰。最令我感到爲難的是一七八九年四月以後的一段日子：一九七九年四月是收集目錄資料最後截止日期，我已答應出版社在六月中旬前呈交稿件；而各地師友在四月以後仍不斷賜寄資料，盛情感人，我也實在捨不得埋沒新到的資料；但是，如果要加入新資料，必須改動排在該條之後的全部項目編號，而且又須改動三種索引的位置，大有牽一髮動全身的難處；總之，增減一條資料，動輒花費三、四小時。我的幾位同工每逢見我拆閱信件、接聽電話、或接待訪客，就下意識地變得提心吊膽。他（她）們的心情我完全可以領略，從四月起，我們每日工作十小時以上，週末假日也不休息，但努力的成績非常明顯，一疊疊數尺高的原稿叫人看到就心花怒放，枯燥而疲累的身心馬上獲得滋補；但在四月以後新到的資料，數量雖然有限，却耗費工夫，而且改動原稿容易招致錯誤，難怪同工們感到頭痛。記得六月中旬準備交稿的時候，收到小川博先生從東京寄來講談社剛出版的《近代日本文學翻譯書目》（一九七九年），發覺有數十條資料爲我們目錄所缺漏。我雖然很想補入，但感到當時同工們每日工作已達十二小時以上，已經疲累不，天氣又酷熱，下午四時半以後冷氣系統停止工作，一百方呎的編輯室頓成另一世界，晚上蚊蟲和飛蛾又大肆活動。考慮再三，我決定將新到的資料放入「補遺」，想不到引致同工們一致反對，堅決認爲還來得及補入正文。結果，我只好派他們趕做索引，由我自己負責增補

新到資料——三日三夜不停工作，勉強及時完成任務。

正如前文所說，兩本目錄的基本目的都是為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提供一份系統性資料和便利。作為研究工作，我衷誠地希望這兩本目錄能引起更多學者注意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因為有不少問題尚待深入探討。譬如說，「現代化」是中日兩國近代史上的首要大事，雖然兩國環境不同，社會背景互異，但在現代化工作上的起步時間大抵接近，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有類似的經歷，而成果則相去甚遠；到底原因何在，我們必須嚴加檢討。過去，在討論中國或日本現代化問題時，學者大多喜歡以「西方衝擊，東方反應」(Western impact, Oriental response)去解釋一切，因而容易視兩國近百多年的憂患為必然，甚或「罪有應得」，連西洋列強強加於兩國的不平等條約也變成沒有所謂平等不平等的問題了。

毋庸置疑，中日兩國各自與西洋的關係固然重要，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也是最重要不過的。以我個人近年所觸及的中日問題為例，其重要性比諸與西方的關係未遑多讓。例如，德川儒學與清代學術，魏源與幕末日本，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清末以來的政治運動，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梁啟超與德富蘇峰，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魯迅、胡適之與日本學術界，近代日本文藝與五四新文化思潮，日本「言文一致」運動與中國「白話文」和「文字改革」運動，中日兩國的「國粹主義」思想、民俗研究、國故整理、對儒學和佛教的批判和復興、乃至家庭、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制度和價值觀的變革等等，中日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兩本目錄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絕非遵循「西方衝擊，東方反應」即可充分了解。近百多年來，中日兩國在現代化起步前後都發生石破天驚的變化，兩國不但面對傳統和西方，而且曾經互相幫助和競賽，也不幸演化成為嫉妬、磨擦和衝突，因而促進或阻延各自現代化的工作。可惜對後者的研究工作似乎未有長足的進展。

在第二次大戰前成長的中日研究者，大都主動被動地在兩國之間的悲劇出場，這苦難的時代遺留下來的是空前的創傷。物質上的創傷較易彌補，精神上的創傷則較難康復，中日人士必須加倍努力。故此，在戰時出生的我非常珍惜戰前譯書的成果，也不敢忽視戰後譯書的發展。我們的兩本目錄雖然距離蔡元培先生「詳益詳，備益備，按圖以索，毫髮無憾」的要求（蔡氏《東西學書錄》），一八七七年）甚遠，但我們希望為同道學者提供一些研究資料和便利之餘，亦希望能夠激發更多學者加入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行列，為促進兩國文化交流與和平友好盡力。

在編纂過程中，荷蒙中日同道學者賜教支援，復蒙陳荆和教授、實藤惠秀教授、小川博先生經常督導，深為感激。參與編務的同工，年來兢兢業業，備極辛勞，謹再鄭重申謝。主編者才識淺陋，兩本目錄諸多未備，疏漏錯誤在所難免，未能充份反映古今譯人溝通中日文化之誠摯與宏願，歉疚之餘，尤望同道君子不吝賜教，俾便改版時訂正。

紀錄三十年來國人生活的滄桑

一覽吾國短篇小說創作的全貌

年度小說選

五十七年～六十八年

57年	45元
58年	60元
59年	45元
60年	50元
61年	40元
62年	60元
63年	45元
64年	40元
65年	70元
66年	70元
67年	70元
68年	100元
全合	8折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

書評書目社